

CCES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腐败与反腐败的 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兰小欢 等 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为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CCES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腐败与反腐败的 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兰小欢 等 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035.4
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兰小欢等编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
(CCES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301 - 26511 - 6

I. ①腐… II. ①兰… III. ①廉政建设 - 文集 IV. ①D035.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2643 号

- 书 名**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
FUBAI YU FANFUBAI DE JINGJIXUE
- 著作责任者** 兰小欢 等 编译
- 策划编辑** 徐 冰
- 责任编辑** 王 晶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511 - 6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em@pup.cn QQ: 552063295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4.00 印张 414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3000 册
- 定 价** 6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前言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如何理解腐败，如何设计有效的反腐政策，都是政府、学术界和公众关心的问题。本书编译了欧美经济学家对腐败研究的12篇论文，既有前沿的研究，也有对既有研究的总结；有关于腐败机制的理论探讨，也有测量腐败的实证方法；有对腐败现象的分析，也有对反腐败政策设计的建议。希望这些文章能帮助国内的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腐败现象。

提出问题是研究的起点。本书的第一章中，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Jakob Svensson 教授提出了八个关于腐败的重要问题：什么是腐败？哪些国家最腐败？高腐败国家有何共同特征？腐败有多严重？高薪是否可以养廉？竞争能否减少腐败？为什么降低腐败的努力（近期）鲜有成功？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吗？Svensson 教授描述和总结了这些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离不开科学的度量腐败的方法。如果连“到底有多腐败”、“怎么腐败”乃至“是否腐败”这些基本的事实都不清楚，就很难继续深入研究。然而腐败是一种隐秘的交易，难观测，更难度量。传统

的问卷调查方式，在衡量腐败方面难有建树。第二章中，麻省理工学院的 Benjamin Olken 和哈佛大学的 Rohini Pande 系统地梳理了近些年在度量腐败方面的突飞猛进的研究进展。与政治和法制较为健全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所以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基于已有的证据，两位学者还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框架，帮助理解腐败官员的行为。官员不仅会对潜在的腐败收益和风险做出反应，也会对某项具体的反腐措施做出反应，从一种形式的腐败转向另一种形式的腐败。

腐败的主体并不仅仅是谋私利的官员，还有积极寻求政府管制而获利的商人，这在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寻租”。在本书的第三章，哈佛大学的 Asim Ijaz Khwaja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Atif Mian 讨论了金融市场中的腐败与寻租现象。关注金融市场，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中巨利诱惑下的腐败与寻租格外猖獗，更是因为金融市场是配置资本的核心。一旦资本配置由于腐败和寻租而被扭曲，损失会波及甚至放大到整个经济体。也正是因为有巨利可图，金融市场改革会减少寻租者的既得利益，往往阻力巨大。

无论是腐败的官员，还是寻租的商人，都不是独立行动，他们间的互动方式是腐败研究者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正如市场中买方和卖方的互动和讨价还价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商人和官员的互动也决定了贿赂的金额。这一金额自然受到市场结构，比如官员之间的竞争或者合谋程度的影响。本书第四章中，哈佛大学的 Andrei Shleifer 和芝加哥大学的 Robert Vishny 就把产业组织理论中对市场结构的简单分析应用到了腐败研究中。该分析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政府无能，各部门官员可以各自任意索贿，行贿的成本会大增。此外，作者们也指出腐败与税收有别。因为非法，腐败行为必须保密，而为了保密给社会带来的损害可能很大。例如，政府可能会将本来用于教育和医疗的资金用到国防和无用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因为后者支出更不公开，更方便上下其手。

只有经济回报足够大，人们才会行贿。推而广之，维持和官员及特权阶层的关系往往花费不菲，那么这层关系究竟价值几何呢？这显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政治关系的价值却极难测算。本书第五章中选取了哥伦比亚大学 Raymond Fisman 教授在这方面的开创性论文。作者研究了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尼西亚的上市公司，他发现每当市场传闻当时在位的苏哈托总统身体状况欠佳，和其他上市公司相比，与苏氏家族有关系的上市公司股价就会下跌。消息灵通的股市与理性的投资者，用手上的股票表达了他们心

目中对这些公司的政治背景的估价。

Fisman 的发现是不是印尼才有的特例呢？本书第六章中，范德比尔特大学的 Mara Faccio 把 Fisman 的思路推广到了 47 个国家的 2 万余家上市公司。她发现：在腐败程度高、对居民境外投资限制严、制度透明度低的国家，有政治背景的上市公司特别常见。比如在俄罗斯，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占了全部市值的 87%。同时，既然上市公司大都有政治背景，那就不是所有的政治背景都值钱，投资者也就只会为某些特殊类型的政治背景买单。

从资本市场回到日常生活，本书第七章中，芝加哥大学的 Marianne Bertrand，世界银行的 Simeon Djankov，以及哈佛大学的 Rema Hanna 和 Senthil Mullainathan 研究了在印度考驾照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大概有六成的人靠塞钱而蒙混过关，虽然有驾照，但他们其实并不会开车。即使是那些认真学会开车的人，很多也不得不靠给钱才能拿到驾照。然而，直接负责驾照考试的政府工作人员并不受贿，所有的钱都流向了某些“代理人”。一旦花钱疏通了这些中介，绝大部分人无需驾考就能拿到驾照。而如果不给中介费，无论开车水平高低，驾考考不过的概率大概是一样的。这说明驾考不完全看重驾驶技术。那些所谓中介机构的存在，都是为了方便官员寻租。

除了行贿受贿，侵吞公共资源而中饱私囊是另一种腐败。很多中央政府的扶贫和救助资金，到不了需要这些钱的人手上，在中途就被地方官员截留。本书第八章中，世界银行的 Ritva Reinikka 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Jakob Svensson 研究了乌干达的这种截留问题。乌干达政府把大约 20% 的公共支出用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上，但收效甚微。利用一种新的追踪资金流向的技术，作者们发现这笔钱大部分到了地方官员的口袋，只有平均 13% 最终落到了学校手里。大部分学校一无所获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资助。而那些相对较富裕的地区的学校，反倒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去讨要到更大一部分补助。也就是说，越穷而越需要被资助的学校，实际拿到手里的钱越少。由于中间环节有侵吞，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效果实际上是累退的。

除了个案研究，经济学家们也利用经济学逻辑去寻找更为普遍的测算腐败的办法。本书第九章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Yuriy Gorodnichenko 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 Klara Sabirianova Peter 就发展了这样一套方法。在正常情况下，能力差不多的人不管干什么工作，实际收入都应该差不多。而

在乌克兰，能力差不多的人，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的工资比私人部门的人的低三成。在很多其他转型国家也有类似现象。在能力越高的人群中，公私部门的工资差距越大，甚至超过六成。如果劳动力市场是自由流动的，这种工资差距应该不会长期存在。作者们发现，虽然工资低，但政府部门雇员的消费水平和所持有的资产总额却和私人部门的差不多，这个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差距可以用来测算政府雇员的灰色收入。这部分灰色收入占到2003年乌克兰GDP的差不多1%。

无论是研究腐败现象还是设计反腐政策，都必须既关注官员手中的资源和权力，也关注官员自身的素质，而这两方面又互相联系。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自然和政治体制有关。在缺乏监督的民选体制中，官员手中掌握的资源越多，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可能反而会越差。本书的第十章中，西班牙阿里坎特大学的 Fernanda Brolo，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的 Tommaso Nannicini，Roberto Perotti 和 Guido Tabellini 阐释了这一现象。地方官员手中资源越多，做官越容易，既能给自己谋利，又有余力讨好选民，帮助自己连任。这么好的差事，想来分一杯羹的人自然就会增多，竞选对手的整体素质会下降，这反而会让那些在任的人更容易连任，继续寻租和为自己攫取利益。这样一来，中央分给地方的转移支付越多，地方官员可能越腐败，而且无能之辈还可能越多。作者们用巴西的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

反腐离不开官僚内部自上到下的监管，也离不开社会的监督。本书第十一章中，麻省理工学院的 Benjamin Olken 展示了自上而下的监管和审计对印尼乡村公路建设工程中腐败的遏制作用。作者在印尼乡村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田野实验，对很多在修建公路的乡村进行随机的审计，那些受到审计的乡村腐败现象明显减少。为了衡量腐败，作者特地雇用了建筑公司和专家建设了几段乡村公路，以估计真实的建路成本，再用这些估计的成本和村里的实际建设支出做对比，用二者的差别去衡量腐败。一般来说，自上而下的审计会有效减少这种工程支出中的水分，但社会监督和监管的作用则很难预料，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当地精英对当地民众的操控程度。

要想让社会监督在反腐中发挥作用，前提是让公众了解官员的活动，尤其是那些重要官员的涉及商业利益冲突的活动。很多国家都要求高级别的官员和政治家向政府汇报自己的收入和商业活动情况。这样的汇报对反腐有用么？本书最后一章中，世界银行的 Simeon Djankov，达特茅斯学院的

Rafael La Porta, 法国 EDHEC 商学院的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以及哈佛大学的 Andrei Shleifer 研究了 175 个国家和地区对国会议员财务披露的法规和执行情况。虽然大部分国家都有类似披露规定, 但绝大部分披露结果都不对公众公开。与不公开的披露相比, 公开的披露和腐败程度有负相关关系。就披露内容而言, 披露财产和收入的来源与腐败程度负相关, 而简单地只披露金额和腐败程度关系不大。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 首先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 没有他的建议和大力支持, 就不会有这本书。我也感谢本书所选录的论文的所有作者, 他们无偿地授予了这些论文的中文翻译版权。在获取版权许可的过程中, 我也得到了相关学报编辑部门的大力帮助, 特别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 Perry Cartwright,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Guffi Chohdri, 美国经济学会的 Kathryn Lee 和 Elsevier 出版社的 Banita Samantray。

我感谢本书的四位译者, 吴小莉、胡冠卿、李佳龙和唐为。他们都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在读研究生。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同事陈庆池教授就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的翻译稿给出的大量修改意见。翻译中的错漏之处, 还请读者批评指正。最后, 本书的出版, 离不开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徐冰女士的努力。

兰小欢

2015 年 7 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关于腐败的八个问题	1
Jakob Svensson	
唐为 译	
1. 什么是腐败?	2
2. 哪些国家最腐败?	3
3. 高腐败国家有何共同特征?	6
4. 腐败有多严重?	12
5. 高薪是否可以养廉?	14
6. 竞争能否减少腐败?	15
7. 为什么降低腐败的努力(近期)鲜有成功?	16
8. 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吗?	18
9. 结论	21
附录	21
第二章 发展中国家的腐败	29
Benjamin A. Olken, Rohini Pande	
唐为 译	
1. 介绍	29
2. 腐败程度与效率损失	31
3. 腐败的决定因素	46
4. 一些要防范的问题:短期和中期里的适应性	56
5. 结语	57

第三章 金融市场中的寻租与腐败	63
Asim Ijaz Khwaja, Atif Mian	
唐为 译	
1. 引言	63
2. 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64
3. 识别寻租及其影响的方法	70
4. 一个积极的议程：设计和评估改革措施	80
5. 结论	83
第四章 腐败	89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胡冠卿 译	
1. 引言	89
2. 基本模型	90
3. 腐败的产业组织	93
4. 腐败和保密	98
5. 结论	101
第五章 政治背景的估值	105
Raymond Fisman	
吴小莉 译	
1. 数据	107
2. 结果	109
3. 稳健性	113
4. 结论	114
第六章 政治关联企业	117
Mara Faccio	
吴小莉 译	
1. 政治关联的发生率	119
2. 政治关联现象在哪比较常见？	123
3. 政治关联的价值	138
4. 结论	140

第七章 获取印度驾照：研究腐败的一种实验方法 147

Marianne Bertrand, Simeon Djankov, Rema Hanna, Sendhil Mullainathan

李佳龙 译

- 1. 介绍 147
- 2. 在印度德里获取驾照 150
- 3. 第一次现场实验的设计方法 151
- 4. 第一次实验的实证结果 157
- 5. 拿驾照的程序：代理人和繁琐程序 166
- 6. 阐释 172
- 7. 结论 174
- 附录 175

第八章 地方截留：来自乌干达中央政府转移项目的证据 181

Ritva Reinikka, Jakob Svensson

胡冠卿 译

- 1. 引言 181
- 2. 制度安排 183
- 3. 截留的量化 185
- 4. 研究地方截留变异的框架 189
- 5. 结果 191
- 6. 乌干达是特例吗？ 194
- 7. 结论 197
- 附录 198

第九章 公共部门薪酬与腐败：用微观数据测算贿赂金额 207

Yuriy Gorodnichenko, Klara Sabirianova Peter

吴小莉 译

- 1. 引言 207
- 2. 数据和样本 209
- 3. 私人—公共部门的工资差距 211
- 4. 私人—公共部门工资差距的决定因素 220
- 5. 衡量贿赂水平 235

6. 结论	238
第十章 政治资源诅咒	243
Fernanda Brollo, Tommaso Nannicini, Roberto Perotti, Guido Tabellini	
李佳龙 译	
1. 理论	246
2. 制度和数据	253
3. 计量方法	263
4. 估计结果	267
5. 结论	282
第十一章 监管腐败：来自印度尼西亚实地实验的证据	289
Benjamin A. Olken	
胡冠卿 译	
1. 引言	289
2. 实验环境	292
3. 实验设计	294
4. 数据	299
5. 实验结果	303
6. 成本—收益分析	320
7. 结论	322
附录	324
第十二章 政治家的财产披露	331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李佳龙 译	
1. 数据	334
2. 披露与政府质量	352
3. 结论	355
附录	357

第一章

关于腐败的八个问题*

Jakob Svensson

唐为 译

几年前，我为一个研究的前期调查项目采访了一位泰国制造业中比较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当被问到在对外贸易部门遇到的政府管制和腐败问题时，执行官感慨地说：“我希望下辈子可以当一位海关官员。”当一位报酬丰厚的执行官也梦想着到政府部门里干工资微薄的工作时，腐败显然就成为一个问题。

腐败对公众利益最大的危害包括侵吞和挪用公款，以及企业和个人行贿以规避那些旨在受益于公众的健康和安全的管制。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扎伊尔前总统 Mobutu Sese Seko，据保守估计共掠夺了大约 50 亿美元的财富，这一数字等于 1997 年他被推翻时整个国家的外债。据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前总统，Mohamed Suharto 和 Ferdinand Marcos，贪污的数额分别比 Mobutu 的高 2 倍和 7 倍（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4）。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肯尼亚 Goldenberg 骗局中，Goldenberg 公司收到了政府出口补偿计划 10 亿美元的资金，作为对肯尼亚产量甚少（如黄金）、甚至完全不生产（如钻石）的虚假商品出口的出口补贴（Public Inquiry into Kenya Gold Scam, 200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内部报告发现，仅 2001 年一年，安哥拉石油收益中有近 10 亿美元，相当于人均 77 美元在政府金库中蒸发（Pearce, 2002）。这一数额大约是安哥拉 2001 年收到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的 3 倍，而安哥拉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每天 1 美元的标准以下，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在 5 岁之前夭折。根据土耳其政府的报告，如果承包商没有行贿，在建造房屋时不偷工减料，2004 年夺走数千人生命的地震所带来的危害会轻得多（Kinzer, 1999）。利用企业和家庭调查数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每年的贿赂总额大约为 1 万亿美元（Rose-Ackerman, 2004）。当然，这一估计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任何与此接近的估计（1 万亿美元大约是全球 GDP 的 3%）都意味着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Eight Questions about Corru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3 (2005): 19–42.

本文将讨论关于政府腐败的八个最常见的问题：什么是腐败？哪些国家最腐败？高腐败国家有何共同特征？腐败有多严重？高薪是否可以养廉？竞争能否减少腐败？为什么降低腐败的努力（近期）鲜有成功？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吗？这些问题并未涉及腐败的所有方面，读者若对其他问题还有兴趣，可参阅 Bardhan（1997）和 Rose-Akerman（1999）的有关述评。

1. 什么是腐败？

关于政府腐败一个常见的定义是为了私利而滥用（misuse）公共权力，当然，什么可以称作“滥用”跟法律标准有关。这样的定义可以涵盖许多种腐败，比如官员私卖政府资产，采购时收取回扣或贿赂，以及侵吞政府资金等。

腐败是一种结果，它反映了一国法律、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特征。不管是有益还是有害的管制都可能引起腐败。比如，当个人为脱罪而行贿，或当监督机制不健全时（比如在一些政府资产贪污案例中），腐败就是为规避某些有益的管制条例的结果。相反的，腐败也可能源于官员故意制定坏的政策或低效率的制度，以向那些试图摆脱政府管制的人索取贿赂（Djankov, LaPorta, Lopez-de-Silanes & Shleifer, 2003）。

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帮助人们思考腐败问题。尽管每一个理论都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腐败行为，但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整地描述腐败现象。

其中一个理论将腐败比作一种税收或费用。如同税收一样，贿赂导致个人实际得到的资本边际产出低于真实的资本边际产出。但是，除了贿赂并未为政府带来收入外，贿赂和税收还有其他的分别。由于行贿受贿必然伴随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贿赂的交易成本比收税更高（Shleifer & Vishny, 1993）。由于腐败合约不被法院认可，一个官员可能在收取贿赂后并未履行承诺，或者向行贿者索要更多的贿赂（Boycko, Shleifer & Vishny, 1995）。

行贿也类似于政治献金捐赠等游说行为，但两者也不完全一样（Harstad & Svensson, 2004）。设想一个国家出台某项政策，向进口某一产品的企业征收关税或者发放许可证，这一政策影响了该行业的所有企业。这时，企业可以向海关官员行贿来规避关税或免除购买许可证，或者，企业也可以联合起来向政府游说，要求免费发放许可证或者取消关税。这里行贿和游说行为的第一个区别是，由游说导致的贸易体制的变化影响到行业里的所有企业，以及潜在的进入企业，但是行贿的收益主要针对某个企业，虽然行贿有时也会出现外部性，使得收益扩散到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第二个区别是，游说导致的贸易体制的变化

更持久，因为重新制定原先的法律需要成本；而官员不能保证未来不再继续收取贿赂。第三个区别是，政府规则的制定牵涉官员们对游说收入和政策变动成本的权衡，而贿赂行为中的决策完全是个别官员考虑私人收益和成本。最后，行贿是公司权衡私人收益和成本后的个体决策，而游说是牵涉相关集体行动的联合行为。关于企业是选择游说还是贿赂，以及这一选择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等问题，可参阅 Harstad 和 Svensson（2004）的分析。

腐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贿赂，虽然往往跟寻租行为相互替换使用，但两者其实并不一样。寻租行为是由政府干预经济引起的，具有高昂的社会成本（Tollison，1997）；而贿赂严格来说是一种利益的转移。

目前尚不存在关于腐败的一个完全清晰的定义，本文重点考察了政府的腐败，事实上腐败也可以指企业间的合谋或者对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公司资产的滥用。有些行为可能打了法律红线的擦边球：比如游说活动中的合法支出，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非法贿赂的政治献金或礼物馈赠，而向那些对自己有监管责任的官员和政治家提供一个退休后的私有部门职务也与提供非法回扣差别不大。

2. 哪些国家最腐败？

因为腐败行为有不同的形式，又具有隐蔽的性质，比较跨国间的腐败水平并不容易。但是，由于腐败反映了一国潜在的制度背景，不同形式的腐败也高度相关。

过去十年关于腐败的跨国研究急速增长，文献中经常用到三类衡量腐败的指标。第一种由私人风险评估公司收集的腐败指数构建而成，最早被 Knack 和 Keefer（1995）和 Mauro（1995）使用。其中由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发布的腐败分数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和国家数量最多，使用也最为广泛。根据创办人的描述，该指数捕捉了一国高级官员索贿的可能性，以及在各级政府之间的非法支付的程度。^①

第二类指标利用许多感知数据的排名进行平均，政策决策者们使用最多的是由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提供的腐败感知指数（Cor-

^① 该数据由提供跨国风险评估服务的私人公司（Political Risk Service）收集，网址为 <http://www.prsgroup.com/countrydata/countrydata.html>。据该公司所称，有超过 80% 的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根据《财富》杂志的排名）利用这一数据和信息来做出商业和投资决策。尽管旧的版本在网上可以获得，但最新的数据需要支付不菲的费用。

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该指数使用的数据来源在各年间有所变化，但2004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是基于12个机构进行的18个排名。^① 根据透明国际组织的说明，被收录的数据来源必须提供序数的测度或排名数据，并且数据必须是衡量整体的腐败水平而非腐败的预期危害。因此，由国家风险国际指南提供的腐败指标没有被包含在透明国际的数据库之中，因为它没有衡量一国的腐败水平，更多反映的是腐败所带来的政治风险。这两者并不一样，例如这取决于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高低。

Kaufmann, Kraay and Mastruzzi (2003) 利用丰富的数据来源，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指标：腐败控制指数 (Control of Corruption)。他们对腐败的定义更为宽泛，涵盖了绝大多数关于跨国各种腐败水平排名的数据，但他们与透明国际加总数据的策略有所不同。事实上，定义和加总方法的不同对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② 腐败控制指数 (2002年数据) 和腐败感知指数 (2003年数据) 的简单相关系数为 0.97，两者与全球国家风险指数 (2001年数据) 的相关系数为 0.75。这三个指标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涵盖的国家和年份不同。^③

尽管学者们将以上的腐败指数作为基数 (cardinal) 序列来处理，但这些主观性的测量本质上是序数 (ordinal) 序列，这是我们在理解该指数跨时间和跨地区的变化时要切切记的。有两个跨国数据给出了基数序列的腐败指数，但在经济学文献中不太常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合作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项目 (EBRD-World Bank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 在1999年和2002年调查了超过1万名企业经理，让他估计“像你这样的企业”一般有多大比例的年销售收入用于向官员支付灰色费用^④，但这些数据只包含了26个经历经济转型的国家。

自2003年开始，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负责的国际刑事犯罪

① 腐败感知指数由德国 Passau 大学和透明国际发布。2004年以及之前一直到1996年的数据可在网上免费下载，网址为 <http://www.transparency.org/surveys/index.html#cpi>。

② 腐败控制指数可在世界银行网站下载，网址为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kkz2002/tables.asp>。

③ Kaufmann, Kraay 和 Mastruzzi (2003) 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加总方法都假定指标中的每一个子项目测量误差相互独立，这一假定可以让它们获得估计的准确度或可信度。事实上，不同指标的制定者会阅读相同的报告，并且很可能相互参考对方的评估结果，因而测量误差会高度相关。如果相互独立假设不被满足，那么使用多种数据来源加总获得的结果就不那么干净，并且估计的准确度也比声称的低很多。

④ 数据可在网上免费下载 <http://www.ebrd.com/pubs/econ/beeps/main.htm>。

受害者调查项目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 Survey, ICVS) 将焦点放在个人而非企业上。这一调查在发达国家采用计算机辅助的电话采访, 在发展中国家采用面对面调查, 得到了一组可供跨国比较的刑事犯罪和受害数据。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由于调查只在首都 (或最大) 城市进行, 所以数据局限于城市家庭。在腐败方面, 受访者被问到过去一年是否有政府官员要求或者暗示为其公共服务支付贿赂, 可以由此来构造不同国家的行贿发生率 (incidences of bribes)。该调查最近一轮包括了将近 50 个国家, 而之前的四轮 (1989, 1992, 1996/1997, 2000/2001) 共 140 次调查则涵盖了超过 70 个不同的国家。^① 行贿发生率与主观性的评价指标也是高度相关的 (简单相关系数在 0.57 至 0.67 之间), 而与需要支付贿赂的家庭比例最相关的指数是人均 GDP。^②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 以及国际刑事犯罪受害者调查的一个明显优势是提供了腐败的直接证据。然而, 采用传统调查方法收集到的腐败数据的可靠性也存在问题, 受访者出于许多原因可能错报或瞒报某些信息。但在某种程度上, 这一测量误差与国家特征并不相关, 所以在进行腐败的跨国差别研究时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这两个数据的一大缺点是只包含了一小部分的样本。另外, 国际刑事犯罪受害者调查只提供了家庭层面的腐败发生率, 腐败事件有多少与腐败有多严重并不一定高度相关, 相关程度还取决于各种因素。它们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显然也可能不同。另一方面, 主观性的指标主要针对私有部门, 特别是国外投资者, 因此数据主要衡量了与商业经营活动相关的腐败, 但腐败还有很多其他类型。

表 1 列出了腐败水平排在最腐败 10% 的国家, 表中腐败水平是基于涵盖范围最广的四类调查数据: 腐败控制指数、腐败感知指数、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的腐败分数和国际刑事犯罪受害者调查的行贿发生率。要注意到, 这一排名并未涵盖所有国家, 而且不同数据的国家样本也有所不同, 例如, 腐败控制指数包含了更多的国家。所有的指标都重新调整了量纲, 使得数值越高代表腐败越严重。

① 数据可在网上免费下载 <http://www.unicri.it/icvs/data/index.htm>。

② 如果用腐败发生率对人均 GDP (取对数) 和其他主观性的腐败指标 (每次使用一个) 回归, 人均 GDP 系数高度相关, 而腐败指数变得不显著。